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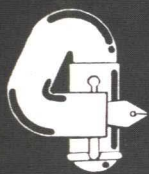
DIZHECANKAOCONGSHU DIZHECANKAOCONGSHU

学林出版社

丛书

22

读查天序



现代的孩子

世纪末的热门话题：MBA

话说第六代电影导演

可虑的「出版泡沫」

哈尔滨特大权钱交易腐败案纪事

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东张西望看日美

.....

宏观调控实录	1
--------------	---

干部素质忧思录	5
---------------	---

未雨绸缪,沉着应对

——欧元启动对中国的影响	12
--------------------	----

基里延科:“我把钱当作一种管理手段” ..	11
-----------------------	----

媒体猎艳,艳女猎钱	16
-----------------	----

世纪末的热门话题:MBA	17
--------------------	----

大学生缘何分配难?	20
-----------------	----

谁催熟了“青苹果”?	21
------------------	----

中国哪些行业赚钱多?	26
------------------	----

轿车何时到你家?	30
----------------	----

我国国有经济中的“在职消费”	34
----------------------	----

唐家璇:跨世纪的中国外交部长	35
----------------------	----

反对伪科学的斗士:何祚庥教授	37
----------------------	----

白岩松说:我们才开始做人,而不是	
------------------	--

做主持	39
-----------	----

胡适先生轶事	45
--------------	----

当中宣部长的陆定一	46
-----------------	----

基辛格评点世纪人物	49
-----------------	----

丁玲与冯雪峰的浪漫情感	54
-------------------	----

冰舞深情	52
------------	----

布莱尔首相一家	57
---------------	----

话说第六代电影导演	60
-----------------	----

可虑的“出版泡沫”	66
-----------------	----

历代名画大流失之谜	67
-----------------	----

中国目前最缺什么?	69
-----------------	----

.....

机构改革有六个特点	69
为机构改革算一笔经济账	69
中国金融业在改革中平稳发展	70
城镇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	70
我去年旅游创汇突破 120 亿美元	71
我国将进行大规模铁路建设	71
中科院终身制成往事	71
我国法官实行等级制度	72
可口可乐为什么不败?	73
——合作能够带来最大效益	
瑞士名表有“秘密”	74
哈尔滨特大权钱交易腐败案纪事	76
法律越来越健全, 执法越来越不公	80
高检院加紧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	80
韦君宜: 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81
“灰色收入”	90
座次	91
一袋快熟面	92
“生活品质”	93
假如重新开始	95
现代的孩子	96
台湾畅销书天王刘墉	97
小说缩写: 人寰	99
自由主义缘何成为热点?	108
——访徐友渔	
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潮嬗变	110

可持续发展 ABC	105
-----------------	-----

改变生活的“因特网”	113
------------------	-----

下个世纪用什么:电脑之后是“光脑”	117
-------------------------	-----

激光打卫星会引发太空武器竞争吗?	118
------------------------	-----

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谈性格双向化教养	120
------------------	-----

中国孩子最懂事	121
---------------	-----

创意精神最重要	123
---------------	-----

——朱棣文谈教育

创新大学制度	124
--------------	-----

让教育成为消费热点	126
-----------------	-----

长江毒,黄河干,怎么办?	128
--------------------	-----

万物生长的奥秘	129
---------------	-----

流星雨是怎么回事?	130
-----------------	-----

走近卡拉扬	132
-------------	-----

吟唱诗人舒伯特	135
---------------	-----

古典音乐唱片品牌一览	137
------------------	-----

中国会申办 2008 年奥运会吗?	142
-------------------------	-----

陈祖德直言围棋热点	146
-----------------	-----

网球明星的魔鬼父亲	147
-----------------	-----

感受香港	149
------------	-----

澳门赌业争霸风云	151
----------------	-----

台湾的核武器计划	154
----------------	-----

美国记者眼中的今日莫斯科	158
--------------------	-----

东张西望看日美	164
---------------	-----

澳大利亚:再见,英国女王!	170
---------------------	-----

附:美联邦简介

北极不夜城	174
谁是谁的孩子?	176
爱斯基摩奇迹	177

都市人最好怎么吃?	178
勤奋工作与心理健康	180
失眠与预期性焦虑	181
请注意你的食后感觉	182
选择补钙剂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182
胆固醇含量并非越少越好	183
谨防药物性营养不良	183
滥用涂改液危害健康	184

世界九大教堂建筑	184
赴澳小常识	185
“华人”不等于“华侨”	185
公民享有哪些隐私权?	186
何为空气污染指数?	187
怎样给电脑键盘除尘?	187
荒漠何以多油气田?	188

书市“拾趣”	4
南宁公务员分流“干个体”	15
林肯的幽默	38
人生琐思	75
家教语丝	90
船夫与哲学家	94
国企难题五“M”	11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人名单	127
宽恕也是政治之道	169

MILU

XIANDAI

DEHAIZI

漫画 暑假(136)

DUZHECAN

KAOCONGSHU(22)

宏观调控实录

□马立诚 凌志军

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

朱镕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认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

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副总理任上。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朱镕基的办法，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

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拿到60%以上，甚至可占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镕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增长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400亿公斤，今年初是200亿公斤，现在快到450亿公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朱镕

基说：“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相当坦率地叙述了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政府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镕基说，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三分之一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致。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问题，有如朱镕基对其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主张坚决地“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只能声明自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然是商量而非命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镕基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中央政府领导经济的权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依靠强制，这是一个显例。

朱镕基是目前党的权力中枢里

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3000万台,而其中三分之一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也确曾发现,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还曾亲临这家工厂来探寻企业改造的秘密。结果他就知道了该厂将在1997年生产580万台彩电,1998年生产800万台,占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它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镕基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因为这正好贯彻了他的“优胜劣汰”的初衷。然而他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它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不得不维持重复建设。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力挽狂澜,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60%,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证明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1996年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00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作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就是朱镕基说的“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为12月16日。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们纷纷责怪朱镕基,有人说“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镕基举出此例来说明人们对他的不能理解和不能支持,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

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所以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中央政府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此后几个月中,股市大致“牛”与“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离大谱。但是,股市上的一派风云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味:普通百姓的追逐实际利益的热情,正逐渐取代追求意识形态的热情,这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到了1996年岁末,也即朱镕基观看《商鞅》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100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9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摘自《交锋——当代中国
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
中国出版社出版)

·书市“拾趣”·

●新《刑法》明文规定了盗版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颁布未几,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就出现了《刑法》单行本的盗版本。

●赵忠祥应某新闻单位之邀为购买《岁月随想》的读者签名,签了半天才发现全是盗版书。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干部素质忧思录

□张贤亮

解放初期,绝大多数干部是坚定的革命者。经历了一系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考验,造就了一代担“大任”者。其数量之众、品质之优,是历代农民起义后的新王朝政权,以及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政权的执政者都无可比拟、望尘莫及的,更不用说国民党政府了。那一批优秀人物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成长起来的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百年来苦难历史自然地在各阶层中择优汰劣出来的结晶。也许这批人对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很陌生,很外行,至少是不熟悉,但凭他们对革命、对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忠诚,也能做出空前的卓越成绩。1949年后有一段时间,是中国自古以来“吏治”最好的时期,至今还有很多老人缅怀当年,心向往之。

然而没料到的是,使这批宝贵的优秀人才在品质上“滑坡”的不是金钱物质权势的诱惑,《甲申三百年祭》警告的情况并未出现,也不是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或出生于农村而对现代化建设的生疏无知,更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鼓舞在现代化建设的

探索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恰恰相反,正在他们逐渐熟悉政治管理,熟悉本行业务,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一次次政治运动破坏了他们最重要的人格中心——诚实,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历练出的最宝贵的实事求是思想。

历史所造就的这一批优秀人物,不可避免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忠诚热忱有余,独立思考能力却较差,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个人权利和民主意识却较薄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看起来是林彪发明的口号,其实是那一代人的写照。所以尽管毛泽东同志很多做法从高层到基层的许多干部都不理解,但仍然能自上而下地畅通无阻。稍有疑虑者,不用毛泽东本人亲自开“现场办公会”,立即会遭到广大干部党员的指责。这样,到1957年“反右运动”后尤其在1958年“大跃进”中,说真话几乎成了禁忌,虚伪倒成了社会风尚。实事求是已经不可能,轻则被批判斗争,重者被处分惩罚,反映真实情况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险,除了极其个别的优秀分子,谁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另一些优秀人物接受了教训,策略地在保

住自己地位的前提下尽量力所能及地减少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给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害,但到了1966年,连这点可能性也丧失了。

“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是古人的政治遗训,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同志恰恰违反了这一条。古文“态”作“虚伪”解。“多态”在“多事”的促使下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会不会“表态”几乎成了能否当干部的主要条件;工作干得好不好在其次,首先要看“表态”,党和政府的各级会议,主要一项议程就是与会者每人“表态”。“表态”好而行迹恶劣仅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表态恶劣”而品行端正可能划为“敌我矛盾”。“表态”关乎是敌是我,是幸或不幸,谁还敢说真话,敢自找倒霉地不好好“表态”?并且,可悲的是某人有了“错误”,非逼着人写“检查”,即使明明知道此人的“检查”是违心的、是假的,但只要符合上级的要求也可“过关”,就是说逼着人非说假话不可。最后发展到各地争相向毛主席“报喜”,发“致敬电”,甚至用舞蹈的形式向领袖表忠心。政治生活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成了一种“作态”,中国政治舞台变成了“假面舞台”,毫无实事求是的严肃性可言。同时,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用“草案”、“纪要”、“通知”、“文件”等形式为法律来管理国家事务也从那时盛行起来。国家政治失去法律规范和道德

规范,干部的腐败就从此开始。

在国家政治管理层面上的某些干部官员可以粗暴、可以懒惰、可以敷衍、可以无知,但却不可以虚伪说谎。世界各国只要有政府便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世界各国政府的通病,但“官僚主义”一词的内涵也不包括虚伪说谎。虚伪说谎,不讲真话,败坏了上下级关系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阻塞了各级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沟通渠道,政治机构变成各个没有真实联系、相互之间不知真实情况的板块结构;上下级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透明度等于零,便无信任可言,任何腐败的事都可能发生。

随着老一代革命者逐渐离退,可贵的忠诚热忱品质也逐渐减少。建国后接班的干部从小在学校中、在家庭里就学会了怎样“表态”,他们就是在那种“表态”的社会文化大氛围中熏陶成长的,1957年“反右”以后,竟然可悲到很多知识分子父母教育孩子首要的训词是:“以后到了社会上千万别说真话!”

今天我们觉得“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实际上在“文革”时已达到了这样的渗透面积,只是今天买方支付的费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物价的提高而高涨,使人民群众再也难以能容忍罢了。过去一包香烟能解决的事今天可能需要一台彩电;过去两瓶酒可取得的某种许可,今天非要四五位

数的人民币不可,如此等等。我知道一件事,可作为非常精彩的小小说细节,是任何天才的作家凭想象编造不出来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语言”:“文革”后期,一个工厂文工团漂亮的女演员,和工厂党总支书记发生了性关系,书记是有妇之夫,久而久之,书记也觉得应给予女方一点什么,便主动问她的要求,请读者猜想女演员会提什么要求。她的要求出乎你现在的意料之外,而在那时却是非常合理、很符合时代风尚的要求,她回答说:“我要入党!”后来她果真入了党。与我同时曾在西湖农场劳改的一个生产大队原党支部书记,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与整个村子的一百多名青年妇女全部有奸情(通奸而非强奸),直到搞了一个现役军人家属才被揭发出来。

过去,付费方式较为多样化:除紧缺商品、生活用品及烟酒食物外,肉体(性服务)、劳动(从给干部盖房子打家具捎带东西到起草报告出主意读文件写信等)、各种无价票证、关系交换,连感情联络都可当做支付方式。在全民普遍贫困的时候,干部的欲望和胃口也不大。现在是已经简化成单一的货币形态,突出了一个字——钱!感情联络已无济于事了,人们才惊呼起来。

同时,过去买方的需求多半不太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如提干调级、迁移户口、推荐上学、荣誉称号、调动工作、请假退休、申请就业、申请住房、增加额外供应、修改家庭出

身、提供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直到女演员提出入党入团之类的事。如今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买方要求,已大大有别于这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今天再不会有一个漂亮女人为了入党而“献身”了。买方的全部要求都指向经济利益,都会使国有资产和纳税人的利益受到直接损失,这才明显地暴露出干部腐化的严重性。

虚伪说谎,不讲真话,不实事求是,是上面有意无意鼓动和鼓励起来的。等到造成严重损失,问题暴露出来以后,上面倒的确有比较宽广的胸怀,将责任全部揽下。我虽然过去读不到报纸,但从“大喇叭”里从来没听到过干部官员虚报成绩、虚伪说谎、不实事求是、“表态”却不兑现而被惩办的案件。我们似乎有个对“内部人”不成文的规定或传统,或者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吧,凡由上面导向错误和政策偏差而造成损失的,全由上面承担,下面不负任何责任。这当然挺好,很公正。然而下面变本加厉、层层加码、超过上级要求搞出的许多罪大恶极的事情,也借机一笔勾销了,执行者决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表态”后也很少查验“态”是否兑现。这并不是下面“官官相护”,而是上面对“内部人”、“自己人”的怀柔政策,这无疑纵容了违法乱纪、谎言连天的反道德行为。

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文革”前

形成、“文革”中发展到顶峰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真正发自人民群众内心。我相信在老一代革命者中是这样。在普通老百姓中,这种现象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其中恐惧占很大成分,就像原始人对大自然的风雷雨电不了解而产生敬畏,出现“造神运动”一样。另外,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卑贱者最聪明”,中国老百姓历来就有对付上面的办法:上面实行“愚民政策”,老百姓就以“愚君政策”来愚弄上面。解放后,对人民群众一系列美好的许诺全部落空,群众,尤其是广大讲究现实利益的农民怎能心悦诚服?1971年,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贫农在瓜田里跟我说过一句令我大为吃惊的话:“驴日的哄我,我哄驴日的!”使我一下子领悟到了中国当时社会真正的局面:上下互哄互骗,那种“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就是这样造成的:上下互动,共同推波助澜,会使任何事情都显得“汹涌澎湃”。

基层干部很多来自农村,与农民有着还未完全脱离的血缘纽带关系,可说他们当中很多人在血缘上就有“愚君政策”的本能:“你哄我,我就哄你!”今天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再公开透明不过的了,但在一些干部还不理解、更重要的是触动他们目前的个人利益或妨碍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仍然奉行“你哄我,我就哄你”的小农传统行为。这就是改革政策

越到基层越难推行,越到基层越会变为形式主义的关键所在。

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将信作为“治民之至道”;“信,国之也”,“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国家“无信”,就形成一种弥漫全社会的非道德化的文化大氛围。我们不能低估过去一系列错误政策给干部官员群众造成的心理扭曲;“哄”上级、虚报冒功、阳奉阴违、形式主义、不实事求是,已经深入到很大一部分干部官员的肌理,尤其在必须承担较多具体事务的中、基层干部身上。长期形成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只看上级眼色办事、随着政治运动风向转弯,早已成了整个社会的习惯,怎能在这段时间中改变?

今天,我们的法律法规不能说不不足,近20年来,平均十几天就出台一项法律法规,可是成文法的强度抵不过不成文法的强度,因为前者是纸面上的东西,后者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几乎成了传统习惯,几乎成了政治“风俗”。在那段历史没有受到彻底清算以前,传统和“风俗”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中、基层干部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可是不管政策对与错,他们又历来可不负任何责任,这怎能使他们对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他们宽大为怀,不计较他们造成的后果,看起来是组织上的恩惠慈悲,其实是将下级当做纯粹的政治工具看待,这怎能调动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本身就感觉到自己不过是

上级手指头下的算盘珠，只等拨一下动一下，这怎能使他们追求工作效率？

我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又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有办企业的经验，亲自品尝过个中甘苦，我自以为可能比一般做资料研究工作的学者的视野稍广阔一点，体验较深切一点。凡我接触到的民间企业家、合资企业代理人、个体工商业者、工程承包商及在市场领域工作的“白领阶层”，即各种经济成份中的职员，无不向我倾心反映，他们多年来与各级官员打交道总结的经验是：中央司局级、省区厅部级、中等城市的书记市长级以上的官员，敢于接受各种形式的“好处”的人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如果和这些官员混熟了，吃饭会来的，宴会会赴约的，卡拉OK会唱的，舞也会跳的，偶然洗洗桑拿浴也未尝不可，但在公开收受财物女色上，他们一般来说有较高的警惕性。但这层官员要么不犯法，要犯就是大案，因为他的“犯罪成本”高，他有资格在“权钱交易”的市场上索取高价。

而在受“县官不如现管”的中国管理传统支配的机关结构里，聪明的行贿者施放“糖衣炮弹”的“主攻方向”多半不指向高层。他们非常清楚：即使攻克了上面，下面还有大量麻烦，所以索性把重点放在攻破“前沿阵地”的“堡垒”，即“现管”干部身上。譬如说，一个厅局要建办

公大楼，决定建楼是厅局长的事，工程交给谁，建筑施工中的质量如何，厅局长未必亲自过问，也不便天天亲自跑工地，工程承包商就会向具体办事人员蜂拥而去，这时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今天活动在各种经济成份中的人们，非常清楚谁最有“实权”。“实权”的意思已经不是决策权，而是执行权了。行贿者一般是指向“现管”的“顶限”，即机关分管那项业务范围的主管官员，这个官员“搞定了”，受贿者甚至能当代理人，其它方面由他去“摆平”。这就是为什么在揭发出来的案件中，负主要刑事责任的多半是分管某项业务的“副”字号人物的原故。

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中，“交际费”或称作“公关”的费用支出，大部分花在把持着执行权、办具体工作的“现管”干部、甚至小小的科长科员或乡镇村民委员会主任身上。很多在市场经济中有经验的人向我感叹：现在是官员级别越低越有钱，不少“现管”干部的隐形收入已超过了高级干部国家规定应得的享受。你别看他们没有小车坐，分配的住房面积小，没有特殊病房，没有或很少有公费出国机会，上不了电视新闻，更没有秘书、警卫前呼后拥，但家里的存款恐怕已达到六位数。一些“现管”干部仅仅在批租土地上，由小额零星贿赂所得，积累下的钱财两代人也吃不完，而任何检查机关都抓不住他们的把柄，小农固有的

狡黠性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最大的发挥。跟我说此话的人就先“表态”：仅他经手的一个小村子就有上百万元人民币“流失”进私人口袋，但他决不会出庭作证。“我这是看得起您，才跟您说！”在贫困地区，首先“脱贫”的必定是基层干部，很多贫困县乡镇的领导已经“率先”步入了“小康”。对很多有“实权”的干部来说，“升官”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了。

读者还可以注意一下，报纸杂志电视各种传播媒体上揭发出来的种种严重破坏行为，如制假贩假、滥砍乱伐、滥采矿藏、掠夺国有资源、进行污染环境性的生产、阻碍合理的工商旅游开发、乱占耕地、层层设卡、路路收费、跨省诈骗、色情营业、犯法不究、殴打执法人员、甚至贩毒贩人等等，要是认真深入调查，顺藤摸瓜，这些毁坏国家危害人民的事情多半有很硬的后台，有的还正是这样那样的基层部门创办的所谓“经济实体”、“乡镇企业”。长此以往，我们留给后代人的将是一片千疮百孔的国土。这类地方上的“生产经营”，有县乡镇这一级干部官员当后台就足够了，还用得着厅长、部长、省长亲自出面实行“保护主义”吗？

需要有“现管”干部官员当后台，正是为了挡住上一级干部官员的监督视察。在目前尚未改革完善的干部制度中，上级也的确很难对

下级采取严厉制裁手段，屡禁不止，屡令不行，上级干瞪眼没办法。正因如此，形式主义就成了上级的心理安慰，或说是下级安慰上级的一种手段。上级也只能用下级的形式主义应付聊以自慰，如果上级对下级的指令连一点形式主义的反应也见不到，那不是太不像话了吗？

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省委书记亲自做出决定要落实政协的某一项提案，并吩咐秘书赶快抓紧办，待我拿着省委书记的旨意和市政府对政协提案的答复，跑到基层开“现场办公会”，一个小小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只说了一句话便将省委书记的决定和市政府对政协提案的答复拒之门外。郊区和镇一级政府的官员在旁边嘻嘻笑，口头上说要执行省委书记指示和落实市政府对政协提案的答复，但却并不知道市政府对政协的提案是怎样答复的，还向我索要市政府答复提案的复印件。原来，市政府向政协答复中的几项措施并没有下达给应具体操办此事的郊区政府。这么看来，市政府一开始就抱着应付省委和政协的态度，对政协的答复只不过是“形式”，郊区政府官员在整个“现场办公会”的过程中一直抱怨市政府并未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毫无结果！过了若干时日，我又询问市委，市委为难地说，市政府对政协提案的答复，下面郊区和乡一级的官员有不同意见。这就不能不令人奇

怪,市政府为什么不在事前做充分准备,将有关部门的认识统一起来再向政协作决定性的答复?对政协提案的答复究竟认真不认真?而这件事绝对是对各方面都有利的,不仅不会损害村民利益还会给市、郊区、镇、乡及村民带来好处,并且不花市政府一分钱,钱由我来筹集。放下电话,我只有仰天长叹。表面看来:这好像是省推动不了市,市推动不了郊区,郊区推动不了乡下老百姓。但一位退休的副市级干部告诉我,正因为在这件事上正式的官样文章太足了:既有省政协的提案,又有全国政协的提案,还有省委书记、副省长的指示,更有两级政府对政协的“答复”等等,而这全部官方来往公文中却恰恰缺少推动具体操办人员必须有的“好处”;地方上有没有好处无所谓,但操办人员的这种“好处”是必须有的。这位退休干

部给我指点迷津,只须我花应该花的钱四分之一至多一半,就能把事办成。“钱要花在刀刃上,花在刀刃上多难办的事都迎刃而解,花不到刀刃上,该办的事情也难办!”可是我不敢这样花钱,我也从“犯罪成本”考虑:倘若以后发了“案”,得“好处”的人受点小处分像搔痒痒,我这个给“好处”的“名人”却会成为重点,于是事情只有搁浅。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即使市政府下属的郊区及乡镇有“不同意见”,也该拿出“不同意见”或是统一成另一种意见了吧?没有,仍然没有!对政协的提案和省委省政府的指示都是如此态度,更不用说别的了。

大厦不会被一群狮子老虎大象撞倒,却会被无所不在的目所不及的小小白蚁蛀垮。

(摘自《小说中国》,陕西旅游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3月27日,叶利钦选择35岁的基里延科替代将近60岁的切尔诺梅

尔金,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有着州共青团官员背景,从燃料动力部第一副部长升任部长后很快获得俄罗斯石油大王和金融巨头支持的基里延科,与他的引荐者涅姆佐夫有一层微妙的关系。基里延科称他“不问政治”、“不是政治家,而是专家治国者”。他声明他的专长是管理,

基里延科:“我把钱当作一种管理手段”

是“把钱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到哪里去要钱”。基里延科声称他“无政治倾向”,叶利钦对这种倾向的认可,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政局技术官员从政时代的开始,但基里延科任职后,一再强调俄罗斯国家权力的基础就是总统。日里诺夫斯基因此而认为他只是“一个大使,一个技术事务秘书”。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未雨绸缪 沉着应对

——欧元启动对中国的影响

1999年1月1日,欧元将正式成为欧盟的统一货币,多少年来欧洲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要变为现实。不仅是欧洲,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一时刻的到来。面对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应在哪些方面做好准备?未雨绸缪,无疑是相当重要的。

欧元与中欧贸易

欧洲历来是中国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目前,两地分别是对方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从转换成本、销售战略、汇率风险、交易风险来分析,中国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

从较短时期分析,欧元的推出会对中国企业产生下列影响:

(1) 转换成本巨大。据估计,就全球而言,向欧元过渡的成本至少达80亿~100亿欧洲货币单位。中国向欧盟国家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纺织品、服装、玩具、鞋类、电器材料、皮革制品等;从欧盟国家主要进口技术设备、飞机船舶、机械产品、仪器、通信电子设备、医药、化工原料及钢铁等。出口商品结构表明,中国的出口企业相当分散,而且中小企业占有相当比重,而欧盟对中

国出口则以大型企业居多。一种新的货币诞生后,企业就得调整原有的财务资料,更新技术设备,培训人员,这一切构成了货币的转换成本。大企业有着规模效益,中小企业既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没有能力去负担巨额转换成本。由此可见,就转换成本而言,中国遇到的困难将比欧洲更大。(2) 各国货币不同,我方企业不同国家里便可以制定不同的价格战略,因为商品是以市场所在国货币标价,这使得同一商品的相异价格不易识别,而且汇率风险的存在也为这种定价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欧元的实施将使得同一商品的不同定价变得一目了然,从而无法实施差别价格销售战略。而且欧元推出后,欧盟将更易于找到削减配额、征收反倾销税的理由。(3) 汇率风险集中,财务管理得到简化。货币统一后,欧盟国家间货币兑换风险消失,我方企业财务人员由盯住多种货币汇率,变成关注一种货币的汇率,财务管理相对简化。但这种好处将主要为大额出口商分享,因为他们的出口对象是分散的,而中小出口商受益不明显,而且在不同货币统一成欧元时,仍蕴藏着不小的折算风险。(4) 欧元的推出并不能消除欧洲与非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易风险,尤其是在欧元的过渡期内,甚至可能会有较大风险。其主要表现为:① 欧元的结算风险。即以欧元进行贸易和非贸易结算时,所出现的风险,体现在